

2001

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

2001 NIANDU XINYI XIFANG WENLUNXUAN

西方文论

王逢振 主编

漓江出版社

西方文论

西方文论

西方文论

西方文论

西方文论

西方文论

西方文论

西方文论

西方文论

西方文论

西方文论

西方文论

西方文论

西方文论

西方文论

西方文论

西方文论

西方文论

西方文论

西方文论

西方文论

西方文论

西方文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1 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美] 怀特等著; 陈永国等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02. 1

ISBN 7-5407-2762-4

I. 2 ... II. ①怀...②陈... III. 文艺理论—西方国家—文集 IV. 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1715 号

2001 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

[美] 怀 特 等著

陈永国 等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25 字数 307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7000 册

ISBN 7-5407-2762-4/I·1644

定价: 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前 言

《2001 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是去年选本的继续。然而,它出版的背景却与去年有些不同。

最近,在外国文学研究界,出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强调回归细读传统,反对新的理论。有的文章表明,作者并不了解他所攻击的理论,却武断地进行否定。本来,在当今世界上,多样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不知为什么有些人一定要坚持单一的批评方式,抑制、反对新的理论?

其实,就文学研究而言,理论并不是什么新的现象。它过去一直存在,只是不那么集中、不那么系统罢了。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围绕文学的理论话语引起了一次根本的变革。如果说现在的理论看上去是新的东西,并不是因为对文学的理论阐述的行为是新的东西,而是因为当代批评作品的数量和质量的变化。当代理论的特点有二:一是它的异质性,即各种理论并不求取一致;二是对传统批评的基础设想进行空前的批判。

文学研究一向是个多元化的学科。构成传统的各种实践,例如文学史、文学传记、道德—美学批评、新批评等,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都一直在一种相当稳定的不平衡状态下共生共存,它们对作者、文学作品的性质以及批评的目的有着相同或相似的认识。批评家对某一作品是否纳入经典可以进行争论,但对

所谓的文学本身的存在并不怀疑,对作者决定作品的看法也不怀疑,对批评依附于所研究的文学对象也不怀疑。而所有这一切,都受到当代理论话语的严厉的质疑和重新评价。

当代的批评理论认为自己不仅已经成为独立的学科,而且已经成为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日常工作。它拒绝接受依附于文学的边缘地位,也不承认是更接近哲学的一种外部关怀。它把自己置于批评事业的核心,坚持认为一切批评行为都不能超越理论。正如许多理论家所指出的,研究文学所用的传统形式的批评,对文学名著的反映不可能没有理论,也不会是纯学术的努力。所有形式的批评都依据某种理论,或某种混合的理论,不论它们是否意识到这点。理论著作已经表明,在文学研究中,那些常常被视为“自然的”、“常识性的”方式,实际上靠的是一套理论指令,对批评家而言,这些指令已经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无须在自己的实践中再做证实。

应该说,大部分理论是抽象的,不直接为探讨文学文本提供一种方法,但对文学研究的方式却有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决不会因理论缺少直接的实用价值而被取消。文学批评学科基本上以与研究客体的直接联系为基础,但这是历史决定的,而不是必然的或自然的。对正统批评的部分抨击,涉及到研究文学的自然方式的确定。如果文学理论有时嘲讽它所抨击的传统,使它看上去像是单一的而不是多元的,那是因为它的抨击目标不是构成传统的批评实践的明显多样性,而是它的基础,它的一整套基本设想——传统的批评顽固地坚持这种基础或设想只能是“自然的”和“可以感觉的”。

传统批评的基础是一种认识论和本体论的确定性,认为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是确定的。每一种批评形式,都侧重于一个不同的方面。例如传记批评强调作者,历史或社会学的批

评强调背景,新批评强调文本自身,道德—审美批评强调文本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然而,它们都接受广义的文学模仿论,就是说,对于生活和人类的生存状况,文学总是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反映并提供所谓的“真理”。文学的任务是描写生活,以潜在的方式描写经验和情感。批评的工作是揭示这种描写的真实价值和意义。这里有一个悖论:这种描写包含在文学之中,却需要批评活动把它揭示出来。

模仿论把语言作为一种透明的媒体,现实可以通过语言以美学的形式再现,并超越其文字的表述。这种语言观又与一种普遍的世界观相联系:人是世界的中心,认识是经验的产物。经验先于表达它的语言,语言只是表达它的工具。按照这种看法,文学是杰出个人的集体产物,他们能以语言表达人类普遍的、永恒的真理。换句话说,文学是少数精英的行为。

当代的理论质疑和批判的正是这套基本的设想,并在批判实践中形成了多种不同的理论观点。通过它们的批判,围绕文学研究的传统共识以及支持它的意识形态,现在已经分崩离析。例如,女性主义把文化政治引入到文学研究,读者反映理论把研究的中心从作者和文本的关系转向文本和读者的关系,新马克思主义强调文化介入并干预社会,后结构主义颠覆传统的形而上学认识,后殖民理论反对文化霸权,后现代主义推进多样性,等等。当前流行的文化研究,更是从多方面理解文化的作用和功能,尤其在当前现时世界中文化的作用和功能。在一个由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混合的世界上,在一个由国家权力、媒体工业和跨国公司构成的世界上,文化生产如何动作?个人和群体的文化身份如何构成?人们如何受到文化力量的影响和控制?在多大程度上受文化形式的支配?在多大程度上或以什么方式可以把文化形式用于其他目的?在多大程度上人们能够成为对自

己的行为负责的主体?又在多大程度上人们的选择会受到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的限制?显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远远超出了传统批评的范围,但无疑会大大推动整个文学研究的发展。

应该说,新的理论的出现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它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高新科技的发展和运用以及伴随而来的经济全球化,整个人类社会结构和国际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人们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乃至思维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面对新的情况,人们如何认识社会,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便成了思想界和知识界的重要任务。于是,有见识、有责任的知识分子对传统采取反思和批判的态度,从不同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和理论阐述,形成了多样理论同时存在、相互影响的繁荣局面。

实际上,正是各种新的理论思想的出现,才使文学研究拓展了自己的范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局面。三十多年来,新的解读经典作品的著作成倍增加,提高了人们的认识,活跃了人们的思想,大大提高了知识分子的自觉性和使命感。对于这种情况,我以为应该持欢迎的态度,参与的态度,而不是倒退到过去,固守已经被证明是过于狭隘的传统批评,更不应采取抵制和反对的态度。当然,传统的批评也有它自身存在的理由。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继续坚持。但不应该采取压制新型理论的态度。为什么不允许多样批评同时存在呢?你可以坚持你的做法,可以用你的成果去说服别人,为什么要无端地指责别人,甚至限制别人的做法呢?如果套用当前文化研究的说法,恐怕其中也含有文化霸权和权力结构的问题,含有知识分子的使命和责任的问题。

鉴于上述情况,《2001 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侧重于知识分子的作用问题,所选文章从理论和实践等不同方面表明了知识

分子如何介入社会和文化现实,即使对经典的解读,也采取新的视角,融入对当前现实的观照。当然,十多篇文章必须有其局限性,不可能全面反映知识界的实际情况,但我们期望它们会引起人们对一些问题的重视,尤其是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知识分子或人文学科的学者如何关注社会现实。在纽约世界贸易中心惨遭破坏的情况下,难道不应该从文化和理论的角度去进行更多的反思么?

王逢振

2001年10月

目 录

王逢振:前 言	(1)
---------------	-------

全球化和文化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论全球化的影响.....	(1)
三好将夫:全球经济中的抵制场	(19)

后写历史

海登·怀特:历史的诗学(《元历史:十九世纪欧洲 的历史想象》前言)	(42)
--	------

论福柯

马丁·杰伊:在注视的帝国里:论福柯与二十世纪 法国思想对视觉的贬抑	(102)
彼得·杜斯:福柯论权力和主体性	(139)

视觉形象

汤姆·米切尔:视觉惶恐

——爱德华·萨伊德访谈录 (171)

斯拉沃热·齐泽克:《黑客帝国》或颠倒的两面 ... (203)

文化的理论阐述

吉尔·德勒兹/费力克斯·伽塔里:根茎(《千座高原》

前言) (233)

约翰·卡洛斯·罗:“把它全都带回家”:美国对越南

战争的再制作 (265)

经典新解

萨克万·伯克维奇:持续革命:乔治·班克洛夫特和

演化过程的神话 (298)

路易斯·A·伦扎:爱伦·坡、亨利·詹姆斯和杰克·

伦敦:私人通信 (329)

修辞解构

J·希利斯·米勒:永远的修辞性阅读

——关于解构主义与文化研究的访谈录 ... (362)

作者简介 (375)

英文目录 (377)

论全球化的影响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王逢振 译

人们对全球化的讨论,常常从它的影响出发,甚至根据它的影响来对它限定,不论这些影响是好是坏。这种做法并非最好的哲学或概念讨论方式,但它使我们抓住其不同的特点,并使我们在进一步讨论之前对它们分类。我认为,这些影响有五种不同的形式:技术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和社会的。

一、人们可以从纯技术方面来谈论全球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到的是传播技术和信息革命,当然不仅是限于狭义传播意义上的创新,而且包括它们对工业生产和组织的影响,以及对商品营销的影响。大部分评论家似乎认为,全球化至少在这方面是不可避免的:“卢德运动”的政治在这里是不适用的(当然也从不会采取那种旧的工业形式)。但这个主题提醒我们,在讨论全球化当中,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它是否不可避免,它是否可以停止或者翻过来?世界的某些部分是否可以排除它或者与它分离或切断与它的联系?显然,这一不可避免性的问题会对我们关于全球化本身的判断产生影响——如果它确实不可避免,那么关于它的弊端或不良影响的道德判断就徒劳无益,或者至多

是围绕如何改善那些不良后果来进行思考,使它们呈现最好的一面,因为无论如何它们无法避免。我们将在后面再讨论这一问题。

二、接下来是关于全球化的政治判断。这里大部分关注的是民族—国家的问题:民族—国家是否已经过时或已经终结?是否仍然要发挥重要的作用,实现某种功能,关于它消亡的报道是天真的和可笑的?倘若如此,全球化本身又该如何?它是否只是多种对国家政府压力中的一种?事实上,我认为在这些讨论背后,潜藏着一种更深层的恐惧,一种更基本的叙述思想或幻想,它们与美国本身相联系。我觉得这里的关键是恐惧,即当我们谈论全球化不断扩展的权力和影响时,我们实际上想到的是美国的权力和影响。当我们谈到民族—国家的削弱时,我们实际上想的是其他民族—国家的削弱,很可能它们的削弱是因为美国的权力,或者因赞成——合作或有意服从——而削弱,或者因各种残酷的力量和压力而削弱。这里在焦虑背后形成的东西,是过去所称的帝国主义的一种新的形式,而帝国主义本身已经经历了各种不同的体现。第一种是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殖民帝国主义,它包括许多欧洲国家和美国及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非殖民化进程,殖民帝国主义被取而代之,出现了一种不太明显但同样有害的帝国主义,通常采取经济封锁和威胁手段,包括派遣顾问和暗中颠覆(如在危地马拉和伊朗),这种帝国主义是一些欧洲国家和美国。现在也许出现了第三种帝国主义,其中美国追逐萨缪尔·亨廷顿所说的一种三重外交政策:其他任何国家不得拥有核武器,推行人权和美国式的选举民主,以及(不那么明显的)限制移民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他显然忽略了第四种关键的政策,即在全球推广自由市场经济)。这种帝国主义只涉及美国(和它的卫星国,如英国),包括它扮演

世界警察的角色,在各种所谓的危险地区进行有选择的干预(大多是轰炸)。这种形式是仍然被称作帝国主义,还是它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种虚伪的、掩饰的“实际政治”?在此情况之下,当各种不同民族屈从于这些意愿时,它们失去的是什么样的民族自治?真的与殖民化时期民族自治的丧失或冷战时期强行结盟的民族自治的丧失相同?在这些条件之下(除了核力量,还有缺乏人权和民主选举,以及移民的可能性),一个主权国家真正失去的是什么力量?

对这个问题可以作出多种非常有力的回答,但它们不再是确切的政治回答。它们可以纳入下面的文化和经济形式,但暂时我们仍尽力将它们分开。如果全球化仍然以传统的语言界定为实际是某种形式的美国帝国主义,那么在全球化的形势下一个主权国家究竟会失去什么?也许是尊严和自尊;但我的论点是那些是文化问题而不再是真正的政治问题。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权可以使民族自尊得到满足,但那很可能只是一种奖赏和附带的利益。

或者,在民族—国家和帝国主义的问题以后,也许我们会达到第三个令人感兴趣的主体,即民族主义。那么民族主义是不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呢?在对帝国主义的讨论里——其中帝国主义被重新命名为文化帝国主义——毕竟总是有某种变化。诚然,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完整的内部政治计划,一向诉诸社会科学家通常所说的文化,而不是经济的自我利益,或者对权力的渴求,甚或对技术和科学成就的渴求。这些也可能是附带利益,但民族主义本身作为一个完整的政治计划,似乎诉诸某种并非技术的东西,也不是真正政治和经济的东西,然而由于我们缺少更好的词语,所以我们倾向于把它称之为文化。

不过,是否总是民族主义者抵制美国的全球化呢?美国如

此认为,也想让你们这么认为,并让你们认为美国的利益反而是普遍性的。鉴于美国的全球利益只是另一种民族主义——美国式的,是否这种抵制只是不同民族主义之间的斗争?某些评论家也想作出如此回答,对此我们将在后面详加考察。

三、在我们谈到文化时,是否民族主义问题或民族自豪和民族尊严是惟一面临危险的东西?并非如此,因为这里有许多其他的问题,其中文化和民族(或种族—民族)与流行或传统文化的形式是一致的,而这些文化形式似乎正被美国的大众文化模式——电视演出、服装、音乐、电影等等——逐出并取而代之。对我们许多人而言(特别是在文学和文化领域工作的人),这是界定全球化的真正核心:世界文化的标准化;美国的电视,美国的音乐,好莱坞电影,正在取代世界上其他一切东西。现在,这种恐惧确实弥漫在我们后面两个范畴之中。一方面,这明显是经济支配和本地文化工业被美国文化工业取代的后果;同时,这种恐惧更深层的方面在于社会,而文化现在被视为惟一的症候。换言之,这种恐惧是,特定种族—民族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文化标准化的过程中将遭到破坏。

但是,如果不看看对文化恐惧的某些反应,我们不可能转到那些经济和社会的考虑。文化恐惧大部分采取低估文化力量的形式,尤其低估文化帝国主义和支配及标准化的力量。在此意义上,通过重新使我们相信美国大众文化在全球的成功并不全都那么坏,那些反应似乎是玩美国利益的游戏。因此它们需要坚持一切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顽固的力量。于是会有一种印度的身份,它顽强地抵制盎格鲁撒克逊进口文化的力量,而这种文化的变化仍然只发生在表面。甚至可能有一种适当的欧洲文化,它永远不会真正被美国化。如此等等。永远不清楚的是,这种仿佛是自然的抵制,是否需要公开的对抗行为,是否需要一种对

抗的政策,一种对抗和保守的政治。是不是在否认各种文化的这一自然力量时,人们是在触犯它们或侮辱它们?是不是由此隐含着印度文化太过软弱,无法抵抗西方的力量?根据过分强调帝国主义的力量就是降低它所威胁的国家、社会和文化的地位,是否低估帝国主义的力量就是政治正确性的问题?我想这是一种愚蠢的反对,而且对它最有力的回答将证明是社会的而不是文化的,我们很快会谈到这里。

无论如何,政治正确性的问题永远不可能以那种形式来解决。一切文化政治都必然面对文化群体力量中过分的自负和对它的策略性的降低这两者之间的修辞选择。这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因此一种文化政治可以突出英雄性,体现出次等人激动人心的英雄主义的形象——强壮的妇女,黑人英雄,法依式的对殖民化的抵抗——以此鼓励所说的公众;它也可以坚持所说公众的悲惨状况,对妇女、黑人或被殖民者的压迫。后面这些也必然会激起愤怒,使被压迫者的境遇以更容易的方式为人们了解,甚至使某些统治阶级支持他们的事业。但这里的危险是,你越是坚持悲惨和无力,在被认为是对所说群体的触犯和侮辱方面,其主体就越显得是软弱和被动的受害者,越显得容易受人支配。两种再现策略在政治著作中都是必须的,它们彼此不可能调和。也许它们对应于斗争中的不同历史阶段,展现政治机遇和再现的需要。然而,除非人们以那种政治和战略的方式来考虑它们,他们就不会摆脱政治正确性中特殊的二律背反。

四、不过,我已经提出,文化问题确实倾向于分别弥散于经济和社会问题之中。让我们首先看看这些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事实上,经济不断地面临消失到全球化其他各层面或各方面的危险。今天,经济力量难道不是至少部分地是技术的力量,或者与新技术控制相关的力量?与此同时,尽管政治力量无疑

服务于经济利益,但在所谓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也可以强化或衍生地缘政治的重要性。至于文化,说到底,后现代性已经具有文化消融于经济和经济消融于文化的特征。因此,一方面,商品生产现在是一种文化现象,你购买产品不仅因为它的直接价值和功能,而且因为它的形象。为了设计商品的形象和推行销售它们的战略,一种整体工业——一种经济机制——已经形成,于是在文化和经济之间广告成了基本的中介。它在各种美学生产当中无疑会受到限制,无论它的存在会使传统的美学受到怎样的质疑。色情也是这个过程重要的部分:广告宣传的策划者是真正的弗洛伊德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懂得性本能投入的必要性,懂得必须使这种投入伴随着商品并使它们吸引人。连续性也有它的作用,通过连续性,其他人的汽车或花园机械的形象会在我购买那些东西的决定中发生作用(由此也可以使我们看到文化和经济折回到社会本身)。因此在商品生产和销售的这种意义上,经济变成了一个文化问题;也许我们还可以推断,在庞大的金融市场上,我们抛出或购入股票的公司的形象也有一个文化的方面。盖·狄保德很久以前就把我们的社会描写成一个形象社会,一个以审美方式消费的景象社会。他以此表示这种将文化和经济分开的接缝,同时又将这两者连接起来,开辟指导一个融入另一个的可能。我们松散地谈到许多有关政治的物化,观念的物化,甚至感情和私人生活方面的物化;现在我们必须补充的是,今天的物化是一种美化,商品现在也以审美的方式消费。

这是从经济到文化的运动,但也存在着从文化到经济的运动,而且它同样重要。这就是娱乐业本身,美国庞大的、最赢利的出口品之一,与食品和武器等同。在重返我们前面的主题之一时,关键是要避免仅只根据文化品位来考虑文化帝国主义,例

如,根据印度或阿拉伯公众对某些好莱坞的形式和主题的抵制来考虑。事实上,很容易使非美国公众对今天好莱坞典型产品的暴力、时间和身体直接性的风格形成爱好,而这些风格的声誉只能靠美国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某种形象来提高。那么,这是否是为西方的普遍性或至少美国的普遍性及其“文明”进行辩护?虽然是无意识的,这无疑是一个被广泛坚持的立场,因此值得认真的、以哲学的态度正视它,即使你认为它有些可笑。

但是,事实上,经济问题先于这种模糊的作为公众趣味的文化问题。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已经作出巨大的努力来确保它的影片在外国市场上以压倒的优势发行,一般通过将条款写进各种条约和一揽子援助计划来实现。在大部分欧洲国家,除了坚持抵制这种特殊形式的文化帝国主义的法国,民族电影工业在战后完全被这种约束性的协议扼杀,它们允许好莱坞逐出民族电影的生产或把它压缩到特殊化的一些方面。这种试图摧毁所谓外国文化保护主义的系统努力,只是更普遍的、日益全球性的兼并策略(现在得到 WTO 的推崇)的组成部分,它极力以有利于美国公司的国际机制代替地方法律,不论是在知识产权方面还是在专利方面无不如此(例如热带雨林资料和地方发明),更不用说蓄意暗中破坏食品的自足了。这里文化已经绝对变成了经济性的,而这种特殊的经济还明确地设定了政治日程,并支配着政治政策。显然,在今天的世界上,仍然存在着相对老式的为争夺资源的斗争,例如为争夺石油和其他原料的斗争:谁敢说这些是帝国主义的现代形式,与以友好的政府(即从属的)代替抵抗的政府那些更早的纯政治的和外交的或军事的努力相同?但这好像是今天更独特的后当代和后现代的帝国主义形式——甚至文化帝国主义的形式——是我一直描述的那种与一些计划相关的形式,如北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关税和贸易

总协定、国际销售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等。这并非因为这种形式的帝国主义提供一种关于不加区分的教科书似的范本,说明经济、文化和政治独特的不同层面之间的汇聚融合,尽管它们是后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和全球化的基本构成。

但是,后者的经济方面也可以以其他多种方式表述。现在我们必须考虑这些方式。我们已经注意到根据更新的技术来考虑经济全球化的方式,也就是技术的出口和进口,对重要信息技术的垄断和完全控制(确实,听说美国实际上控制着信息技术,其他可能的竞争者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在竞赛中失败)。我们也注意到全球化的推进可以从法律结构上来说明,这种法律结构维护并推动美国商品在海外的渗透。

现在,我们需要触及一下相关的问题,即公司和金融问题,以及文化和消费本身的问题。跨国公司——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曾被称为多国公司——是新的全球化的第一个迹象和症候,间发性地引起对可能出现某种新的双重权力的政治恐惧,或对这些跨国实体可能胜过政府的政治恐惧。这种恐惧和幻想的疯狂的一面,无疑被政府与公司商业活动(和两者之间人员交流)的共谋所缓解——这种现象随后应引起另外不同的焦虑。特别是自由市场的雄辩者,他们总是谴责政府干预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日本模式。与此同时,新的全球合并结构上更严重的特征是,它们能够通过把自己的活动转到海外更便宜的劳动力市场而破坏本国的劳动力市场。迄今为止,还没有可比的劳动力转移的全球化与这种新发展的资本和公司的流动性相对应。

金融资本主义是这种新的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特殊情况(它之所以成为可能也与由新技术打开的同时性相关)。这里我们要涉及的不再是劳动力或工业的流动性,而是资本本身和投资的流动性。对外国货币的思考是新的国际形势的一个重要的症